责编：王翠娟 E-mail:wangcuijuan2008@126.com Tel:010—62806237

◆书 摘

道德如何才能产生

□詹姆斯·雷切尔斯 斯图亚特·雷切尔斯

17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试图表明，道德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相反，道德应当被作为因利己的人而产生的时间问题的解决方式来理解。我们都想生活得尽可能地好，但是，除非拥有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不能实现繁荣。而如果没有规范，我们就不可能有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于是，道德规范正是我们需要的、能够从社会生活中获益的规范，它——不是上帝，不是利他，也不是“道德事实”——才是理解伦理学的关键。

霍布斯开始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社会规范，并且没有强化规范的一般公认的组织结构，会怎么样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愿意，没有政府之类的——没有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自由地做我们高兴做的事情。霍布斯把这种状态称为“自然状态”，那会是什么样子？

霍布斯认为那会很可怕。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好，而是因为人类生活条件的四个基本因素。

相同需要的因素。我们每个人为了生存都需要同样的基本的东西——食物、衣服、住所。虽然我们在某些需要上是不同的（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岛素，而其他人不需要），但我们所有的人在基本需要上都是相似的。

短缺的因素。我们不是住在伊甸园中，我们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不存在足够的供应。我们不得不努力工作，把它们生产出来，而且它们甚至还不足以分配给大家。

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以供分配，谁将得到它们？由于每个人都想活命，而且想活得尽可能地好，因此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地得到更多。但是我们会胜过其他那些也想得到稀有物品的人吗？霍布斯认为不会，因为人类的力量基本相同。没有人在力量和机敏方面比其他人更优越，以至于他能够毫无疑问地胜过其他人。当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强壮，但是甚至更聪明、更强壮的人也可能被其他一起行动的人所击倒。

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获胜，还有什么别的希望吗？例如，我们可以依靠其他人出于仁慈或好意来帮我们吗？不能，因为还存在有限的利他这一事实。即使人们不是完全自私的，他们也是较多地关心自己，而且我们不能直接假定：无论何时，在我们最重要的利益与他们最重要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退让。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放在一起时，一幅残酷的图景就出现了。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同样的基本物品，并且它们不够分配，因此，我们将处于一种为得到它们而竞争的状态。但是，没有人拥有能够在这场竞争中制胜的东西，并且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放弃满足自己的需要。其结果，如霍布斯所说，是“持续的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有望成为赢家。想生存的理性的人将试图抓住他需要的一切，并且准备保卫它，防止进攻。但是，其他人也将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会是不可忍受的。

霍布斯认为，这不只是推测。他指出，当政府垮台的时候，就和发生市民暴乱期间一样，这些就会实际地发生。人们开始绝望地囤积食物、武装自己并且把邻居关在外面。并且，在世界各国之间，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就像个人一样处于自然状态，它们持续地彼此激烈争吵，装备起来，并且互不信任。

显然，为了逃避自然状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合作的方法。在一个稳定并且合作的社会中，基本物品的总量能够增长，并且能够分配给所有需要它们的人。但要使这种情况出现有两个必要的条件。首先，必须有担保，保证人们不愿意彼此伤害——人们必须能够为履行他们的协议而彼此信赖。只有这样才能够存在分工。如果一个人种植食物，而另一个人帮助病人，还有其他人建造房子，那么由于每个人都期望分享其他人制造的利益，因此每个在这个链条上的人都能够指望其他人会如期的那样行事。

一旦这些保证都能到位，社会就能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比处于自然状态下更富裕。但是这只是霍布斯的主要观点之一——为了这些能够发生，政府必须建立起来，因为是政府以及它的法律、警察和法庭体系，确保了人们能够在生活中把对袭击的恐惧降到最低限度，并且愿意与他人履行他们的交易。政府在这个计划中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为了逃避自然状态，人们必须赞同用来管理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并且必须同意建立有权力强化这些规范的行政机构——国家。根据霍布斯的观点，这样的约定实际上是存在的，并且它使现存社会成为可能。这个“每个公民都是其当事人”的约定，被称为“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理论不仅解释了国家的目的，而且解释了道德的性质。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国家存在以强化对现存社会来说具有必要性的规范，而道德则在于促进现存社会的整个规范体系。

只有在社会契约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成为仁慈的存在者，因为契约给我们创造了关心他人的条件。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只为自己，任何人采纳“关心其他人”的政策都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利益持续地限于危境。但在社会中，利他变得可能。通过把我们从“对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中解脱出来，社会契约把我们从提防他人中解放出来。让·雅克·卢梭是霍布斯之后被认为最接近这一理论的法国思想家，他走得更远。他说，当我们与他人进入一种文明的关系时，我们就变成了不同种类的动物。这要求他把私人的、自我中心的倾向放在一边，赞同无偏私地推进每个人福利的那种规范。但是，他能这样做只是因为其他人已经同意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契约的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将道德的社会契约概念概括如下：道德在于管理自己行为的规范体系，在其他人愿意接受这一规范体系的条件下，理性的人也愿意接受它们。

摘自詹姆斯·雷切尔斯、斯图亚特·雷切尔斯《道德的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发表时文字有改动。

◆读书方法

重读经典的几个理由

□郭继民

国学热愈演愈烈，读经典固然不足以覆国学之全，却得国学之要。倡导重返经典，其理由至少有四。

其一，经典（原典）呈现的乃是整体思维的智慧：尤其经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仍能流传下来的著作乃表明其已具有超时间的永恒价值。作为传承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经典，皆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经典著作多呈现出一种混沌未开的智慧状，后人可从同一部经典著作中习得哲学、美学、文学、逻辑、历史、伦理乃至自然科学层面的东西。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从老庄中能读出获得“混沌论”之灵感，数学家莱布尼茨则从《易经》中看出二进位制之思想。自然，就专门研究而言，由于受制于时代，经典也许自然存在某些不足，但经典所放射出来的“整体思维模式”和“在沉寂中生长生出的智慧”足以使其超越时空。以诠释哲学著称的当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经典的超时间性是建立在经典的时间性之上的”，此言甚切。

其二，经典呈现的乃是至醇至真的生活样态。经典之为经典，除经典所散发出的思想外，亦在于著者本人的至醇至真的心态和由此散发出来的“真诚”的生活气息。读《诗经》当赞叹孔子所谓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之感悟；读《论语》当想见孔子的醇厚与朴实样态，犹如与智慧老者对话；读《老子》则如见沉默但却智慧之人，间或将宇宙之道告知一二；读《庄子》当如见赤子率真之情显现于我们面前，使得我们不敢生丝毫虚伪、藻饰心，一发同他一样天真起来。即使兵书、权谋书如《孙子兵法》《韩非子》者，亦无过多渲染，三言两语将问题阐述得清楚明白，一种果断、干练之气氛扑面而来，可谓“读其书如见其人”。国学如此，西人之书本亦然，《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问题的步步追问，《沉思录》中古罗马帝王马可·奥勒留真诚的心灵剖析和感悟，《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在上帝面前的毫无隐藏的心灵解剖，等等，莫不凸显诚实、率真之情。已经疲惫于当下喧嚣之的现代人，愈寻找心灵栖息之地，回归经典并在宁静中体味斯人“元气淋漓”真诚生活无疑是至佳选择。

其三，经典呈现的不仅仅是“浓缩的智慧”，更是我们的存在之根。经典之为经典，首先在于其本身乃智慧之凝结，读经典之作若“含英咀华”芬芳人之颊齿，精耀人之精神。愈加读之、思之、揣摩之，益发觉其言微义远、言简旨高。孔子昔日有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之感叹，读经典确实能让人魂不守舍、一咏三叹。即便读数则格言、语录，亦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以读《老子》为例：初读得其隽永之意，为其文风之简朴而动心；复读得其言外意，口若含香，为其大道之玄远、奇妙而流连忘返；再读则又复归于“朴”，于恍惚中透出宇宙、社会、人生演化之轨迹，乃至回归“自我”之立身处世。要之，读经典书，常读常新，随着阅历日渐丰富，经典亦发如魔幻之术，不断将“浓缩之智慧”展现展示出来——自然这种智慧之展示含有西方解释学所谓的“主客交互”之义——读经典书，不由大发感慨：古人不余欺也！

其四，经典乃创造之源头。无论我们继承传统还是发扬传统乃至开拓创新，均离不开“经典”，甚至对经典的“反叛”，也需建立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之上——“五四”的“闯将”多为熟稔传统文化之精义者，若不懂经典，又焉能对经典进行强有力的批判？——此皆言经典之重要。我们尊重经典乃在于经典之原创性、开放性、多义性能提供给后人以智力支持和思维启迪。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曾说“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愚以为，这“生机勃勃的传统”指的就是经典的“启发性”和“开放性”。

我们重返经典绝非意味着“惟经典是从，死在言下”，而在于通过对经典的回溯，重新“找回”我们的智慧之源，进而生发出一种智性的活力，以滋养我们的未来。古人有“穷途则知返”“人穷则返本”，这个“返”“本”对游子来讲意味着“家”，对一个民族来讲则是文化之根本。纵观人类发展史，似乎人类“思想高潮”皆从本（经典）中“生发”出来——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返回的是“古希腊”的理性，中世纪以降的西方哲学家莫不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经典著作处着力，中国古代哲学家又何尝不从先秦诸子百家处用功。从经典出发，而有“亚经典”之诞生，以儒家传承为例，古儒皆《论语》《易经》为经典，而开辟出《孟子》《荀子》《传习录》等“亚经典”；近人同样以《论语》《易经》为典，而有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冯友兰、方东美、张君劢等现代新儒“八大家”之形成。从经典中吸取智慧并与时代精神、个人学养相摩荡与氤氲，就有可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易经》乾卦所言“与时偕行”即明确表明此意思。

最后，还应强调，我们重回经典并非时下某些以回归经典做幌子而实则谋划个人私利的“炒作”，斯乃对经典的亵渎，亦是对大众的欺骗。而是与古人对话，并与古人一同思考社会、人生乃至宇宙。这种回归不需要我们大张声势，只需我们静静地捧起一本经典著作，悄然地走近古人，走进一个古朴、稚拙而又充满大智慧的神秘境域。

真正进入经典，也意味着我们穿越时空去追寻我们祖先曾经“居住”而今我们仍需栖居的精神家园。

◆名人读书录

“勿杀书头”与“坐冷板凳”

□王学斌

自古学人开门办学，授徒心得各有千秋。譬如清末民初学者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章氏之说，自是对传统学术演进脉络之概况，或尚有一层自鸣得意之情：其高足黄侃在音韵训诂方面，较之乃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可谓大国手门下出了个顶稀罕的大国手。

黄侃曾先后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执教，堪称名师，同时又是位“特别教授”。黄侃专攻《说文解字》，课堂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们对其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找书翻检对照，居然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 9300 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 5 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黄侃之所以能如此精通《说文解字》，与其读书习惯大有关联。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圈点 3 遍。《清史稿》全书 100 册，700 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他亦凭此方式引导弟子读书。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 24 种。后又要求学生在 30 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就等于摸清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再调头审视唐之后作品，颇有一览众山小、顺流而下的感觉。如此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

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在心。

黄侃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
昭裔难忘发愤时。
十载才收三万卷，
何年方免借书痴。

可见黄侃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书痴”。

除却读书之规矩，黄侃在治学上还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他更是以身作则，“坐穿冷板凳”，50 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

其实，黄侃所言 30 岁前不发文，50 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黄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或许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磨练，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若是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所以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历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因此，学人们如果功利心过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写文章著作里完全体现，甚至奢望超水平发挥，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应。在如此心理驱动下，学人们往往沦为“快手”“高产学者”，一年论文一二十篇，不论质量如何，先以数量胜人。但不容忽视的是，锋芒毕露的同时也时常意味着破绽百出。“欲速则不达”，往往是此类快手、高产学者们最应牢记却最易忽视的金玉良言。“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又唯有如此。

黄侃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慎于著述。其师章太炎曾告诫他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1935 年 3 月 23 日，黄侃 50 岁生日，章太炎送他一副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 50 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意思是希望黄写出绝妙的著作。

不料，黄侃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其中含有“绝”“命”二字，心中不快，以为不祥之兆。同年 10 月 8 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而死，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悔痛不已。

哲人其萎，唯有于著述中领略其醇厚学养与独有气质；风范长存，自当常常回味其读书治学箴言：“勿杀书头”与“坐冷板凳”。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 年第 1 期要目

决策要闻
习近平：纪念毛泽东不能把历史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本刊策划
“政绩考核新规”新解(共 7 篇) 桑助来等

理论视点
应准确把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部署 陈锡文
深化审判体制与机制改革 江必新

改革纵横
防止对地方政府债务误判 张 季
社交网络的发展与我们的对策 吴世忠

治党论苑
努力提升反腐倡廉建设实际效果 王延中

热点观察
2014 年经济运行谨防五大风险 余 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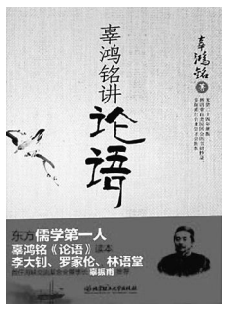
地方探索
三个“1+X”：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孝感探索”
——访中共湖北省孝感市委书记陶宏 本刊记者 吕红娟

从政心得
如何选准突破口，尽快打开工作新局面 陈 伟

环球视野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何曾失去政权 张 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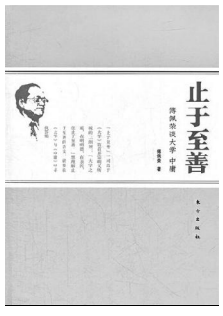
舆情分析
2013 年 12 月网络舆情热点分析 东 鸟 李国祥

◆好书推荐



书名：《辜鸿铭讲论语》
作者：辜鸿铭
出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编者谈书：辜鸿铭认为欧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因此决定亲自为欧美人讲解《论语》，由此作此书。有汉学家曾评价他：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因此，该版本也成为通行世界的唯一《论语》读本。



书名：《止于至善：傅佩荣谈大学中庸》
作者：傅佩荣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作者谈书：“四书三玄”本来包含七本书，但因为《大学》与《中庸》篇幅太少，经常被合为一本，结果就成了六本书。我为“四书三玄”做了译解，同时也陆续出版了上课讲解这些经典的详说本。许多读者说，他们从详说本获益更大，因为我在讲解时，引述了不少故事、案例、个人经验与心得，使枯燥的原典变得较为活泼有趣，可读性更是显而易见。《大学》和《中庸》是这一系列研究中最后完成的两本。古人与我们一样，会从生活经验中归纳出深刻的智慧。因此，我在诠释时所取的标准有二：一是经典本身的主要概念与各章节必须圆融一致；二是经典所说与今日生活经验必须相互印证。